



中國人民大學 学报

工作论文系列

Working Paper Series

贯通文理，面向世界

忆我国信息管理学科的创建者——陈余年教授

陈禹 方美琪

JRUCWP2024030

2024. 04. 28

- * 本刊编辑部将那些已通过审稿程序而处于“拟录用”状态的稿件制作成线上展示的工作论文，旨在及时传播学术研究成果而促进学术进步。编辑部还将继续与作者共同努力，修改完善论文，并在其达到刊发标准之后择期正式刊发。当然，若工作论文被发现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则仍有可能被退稿。

贯通文理，面向世界

忆我国信息管理学科的创建者——陈余年教授

陈禹 方美琪

陈余年是我国著名的数理统计学专家、计算机信息管理科学的创建者，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原经济信息管理系）的创建者。陈余年在数理统计和经济信息管理领域精心耕耘半个多世纪，高瞻远瞩、戮力创新，育人无数。特别是在经济信息管理专业的创建过程中，为国家和中国人民大学作出了创造性的卓越贡献。陈余年的奉献精神至今激励着广大后辈为科学事业努力奋进。

一、开拓中国的信息管理学科

青年时期的陈余年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曾在武汉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先后攻读学位，成绩优秀。这段教育经历为他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更拓宽了他的国际视野。1955年，怀着一颗爱国之心的陈余年携妻女回到中国，立志投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事业。回国后，陈余年被安排到中国人民大学任计划统计系副教授，开始教学与科研工作。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教学与科研事业百废待兴，需要培养各方面的人才。陈余年和萨师焯、江昭、魏晴宇等人联名向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领导提出建议：“建立经济信息管理系，并立即招收理工科的硕士生和本科生。”这一建议在一贯以文科领域见长的中国人民大学实属石破天惊，在全国也属于前所未闻的创举。陈余年等人能够提出这一创举绝非偶然，而是他们个人的教育经历以及长期思考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成果。以陈余年为例，他曾留学美国，眼界开阔，通晓英、法、德3种文字，可谓知识渊博、文理兼修。1955年回国后，在当时全盘苏化的大环境下，服从组织安排的他主要从事数理统计学的教学与研究，与此同时仍然密切关注学术前沿动态。陈余年等人通过当时非常有限的资料渠道，一直密切关注国外相关学科领域的最新进展，即使因此遭受无端的批判和非议也从未放弃。在长期观察和研究后，陈余年等人敏锐地抓住了用计算机处理信息并为经济管理工作服务这一新动向，并由此认为在中国人民大学创立经济信息管理系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陈余年等人坚持探索学科先进动向的努力没有白费。1978年，科学的春天恰逢其时。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领导成仿吾、郭影秋坚决支持陈余年等人建立经济信息管理系的建议。面对“中国人民大学是文科学校”的质疑声音，校领导响亮地作出回应：“文科学校办理科是方向！”1978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决定建立经济信息管理系。这是全国第一个明确地运用计算机技术、现代数学和统计学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理工科专业。陈余年担任经济信息管理系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萨师焯教授担任系主任，江昭教授担任副主任，魏晴宇教授担任教研室主任。建系之后，陈余年不顾六十多岁的高龄，坚持亲自教授COBOL编程语言，而在当时中国几乎没有人会运用编程这项技术。

作者：陈禹，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13901217331@163.com；方美琪，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13501263680@163.com。

* 本刊“经师·人师”专栏以此文向大先生陈余年致敬。

二、培养中国信息管理事业培养第一批骨干

与建立经济信息管理系具有同样深远影响的重要决定是“立即招收理工科的硕士生和本科生”。由于当时已经错过了第一批硕士生初试的时间，为了招收学生，陈余年和几位老师奔走于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计算机所等单位，通过各种渠道，尽力搜寻已经通过初试而复试落选的考生。在他们的努力下，最终招来 13 名学生。同年，本科招收 49 名学生。1978 年 10 月，经济信息管理系的首批本科生和硕士生同时入学。两个学历层次的教学任务同时开始，陈余年和几位老师分工合作，筹集资料、设计课程、编写教材，忙得不可开交。其中，负担最重的是陈余年教授。作为学术委员会主任，他总揽课程的设计和安排，并亲自担任了多门课程的教材编写和教学任务。其中许多课程是国内从未开设过的，甚至课程的名称都需要根据国内当时的情况斟酌。例如数据处理概论、信息系统的分析与设计、数据库管理系、离散数学、数据结构等等。为了避免生硬直译和引起误解，他们分工合作，一边翻译外文资料一边进行教学工作。特别要指出的是，陈余年等人设计的课程受到信息管理从业人员的密切关注，获得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当时听课的不仅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还有许多其他单位的旁听人员，其中不少人成为后来中国信息管理界的骨干。

陈余年撰写的教材为后来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打下了深厚基础，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1990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陈余年编写的《信息系统工程（上册）》。这是国内最早规范化地介绍管理信息系统的著作。1999 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余年编写的《信息系统工程中的面向对象方法》，同样获得积极反响。关键的概念往往对学科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这本书中的“面向对象方法”就是计算机领域的关键概念。在书中，陈余年用科学的语言定义了程序设计中的重要概念，例如“对象”“类”“接口”“封装”等等。这些概念定义清晰之后开展编程和建立信息系统就方便了许多，也为后续的科学研究的铺平了道路。在这两本著作的写作过程中，陈余年参考了上百本的国外参考书，力求内容准确且反映前沿趋势。在这些著作的知识支持下，经济信息管理系的老师和学生为诸多机构编制了实用的信息管理系统。例如解放军总医院、鞍钢、青岛印染厂、天津港等都采用了他们设计的系统。这些系统获得了用户的好评，也收获了很多奖项。

陈余年主持设计的课程和撰写的教材在当时引领了学科发展的前沿趋势，培养了中国信息管理事业的第一批骨干。这些骨干成为学界和业界的中流砥柱之后，仍然感恩陈余年作为学术和人生领路人的教诲。

三、瞄准世界科学前沿，努力打破文理界限

陈余年的治学精神难能可贵，其中的两个特点特别值得学习，那就是**面向世界**和**跨越文理**。科学没有国界，文理不应分家。这两个道理虽然浅显易懂，然而在实践中却困难重重。陈余年身体力行，践行了这两大精神，可谓后世表率。

文理科之间的藩篱由来已久。在中国，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曾经盛行一时，社会科学不被视为是科学的看法也曾影响很多人。1978 年招收的第一批经济信息管理系硕士研究生中，“重理轻文”的观念更是根深蒂固。当时，相当多的学生对于社会科学可谓一无所知。陈余年为了帮助学生拓宽视野、打破文理之界，指导学生阅读大量的综合类英文刊物，例如《Scientific American》《Science》《Time》《Geography》等杂志和大量英文名著。这些英文读物成为广大学生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阶梯，由此也启发了学生们对于社会科学的重新认识。直到这些学生走上院系领导的岗位后，陈余年还多次告诫：“不要把信息学院办成计算机学院！”意在打破文理科之间的藩篱，拓宽学院的社会科学视野。

陈余年在促进国际交流、拓宽国际视野方面贡献巨大。其中，经济科学实验室的创建就是一个

典型案例。1993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佛农·史密斯教授在《Scientific American》上发表文章介绍了他引导建立经济科学实验室的创举,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经济科学实验室。对于当时的中国教师和学生来说,社会科学竟然能有实验室、能用计算机做实验,绝对是闻所未闻,无法想象的。陈余年迅速注意到实验室建立的新动向,于1994年带领几位骨干教师前往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桑,亲自访问了史密斯教授的经济科学实验室。在十天的访问中,访问团队学习了经济科学实验室的理念、功能和运作机制。回国后,访问团队立刻向中国人民大学领导报告了此行的收获,并建议中国人民大学建立经济科学实验室。袁宝华校长不但立即批准了建议,在信息学院成立了经济科学实验室,还亲自题写了实验室的名匾。这一创举立刻在国内引起了热烈反响和广泛关注。1997年,该实验室获得教育部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教育部高教司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全国的第一次经济管理类实验室交流会,并决定此后每年举办一次。2002年,史密斯教授因为经济科学实验室的创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人大访问团作为老朋友,在热烈祝贺之余邀请他来北京访问,他欣然应邀并于2005年访问了中国人民大学,亲临经济科学实验室考察,并给来自全国近百个院校的同行了做了报告。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全国经济管理专业普遍建立起了以计算机等信息技术为手段的、为经济管理专业服务的实验室。据不完全统计,这类实验室已经超过600个,并且得到教育部的固定经费支持。毫无疑问,袁宝华校长、陈余年教授是帮助中国开创立经济类实验室的先驱。现在中国各大高校能广泛开设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离不开他们的努力。

四、诲人不倦,不计名利

许多同事和学生提起陈余年都要称赞他高尚的人品:诲人不倦,不计名利。

陈余年不计名利,从未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只在诸如钱学森教授主持的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这样的学术团体中担任过理事职务。尽管没有任何行政职务,陈余年对于国家、学校和学生的关心和帮助却有口皆碑。陈余年的学生至今对于他的悉心呵护、循循善诱都记忆深刻。1978年,人大经济信息管理系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普遍对于即将要学习崭新的计算机知识感到忐忑不安。其中有一位学生问陈余年:“我是师范毕业的中学教员,从没有见过计算机,能学这个专业吗?”他马上鼓励道:“只要有恒心,没有不能学成的!”并且非常具体地指出了需要重点补习的学科和领域,强调跨越文理界限、注重思想方法等关键点。这些教诲对于学生来说是终生受用的思想财富。除了教学之外,在学生毕业后的工作过程中,陈余年也多次给予关键性指点。例如,陈余年退休之后,从国外给人大信息学院的教师们捎来了介绍圣塔菲研究所的《Complexity》一书。当时该书还没有中文译本,中国也没有人介绍过圣塔菲研究所。陈禹、方美琪等教师在陈余年教授的指点下,抓住复杂性研究这个新方向,主动联系该研究所,成为中国大陆首批访问圣塔菲研究所的学者。他们的研究引起了钱学森教授和成思危教授的关注,此后产生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在复杂性研究这个新兴领域,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能够处于前列,毫无疑问离不开陈余年的引领和帮助。

陈余年一直牵挂着中国人民大学的建设。退休之后,陈余年应袁宝华校长的亲自邀请,义务担任了中国人民大学外事顾问,与当时的外事处长金戈配合,为开拓中国人民大学的对外学术联系做了大量工作。除了信息学院之外,他帮助建立海外联系的还有计划统计系、哲学系、经济系等其他院系。其中后来与哲学系建立密切联系的美国著名学者张绪通博士就是陈余年帮助联络的。1997年,李文海校长率团访美,陈余年协助联系美国方面,精心安排行程,促成了此次访问交流。这些工作都发生在陈余年退休之后,可见他无时无刻牵挂着学校的发展,一直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陈余年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年了,但是他的谆谆教诲始终萦绕在学生的心头,他的远见卓识和学术风范仍然在鞭策着后辈。陈余年对于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计算机信息管理科学领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作为后辈,一定要努力继承陈余年教授的事业,砥砺前行,为祖国的繁荣、科学的进步而奋斗。